

雄师飞渡琼州海峡

■姚小锴 王凤春



海南岛战役使用的木帆船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指挥第40、第43军等部,在岛上琼崖纵队的配合下,横渡琼州海峡,粉碎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以伤亡45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共计3.3万余人,解放了海南岛全境。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缺乏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仅凭2000多艘木帆船和100多艘机帆船成功实施的一次大规模岛屿进攻战役,创造了我军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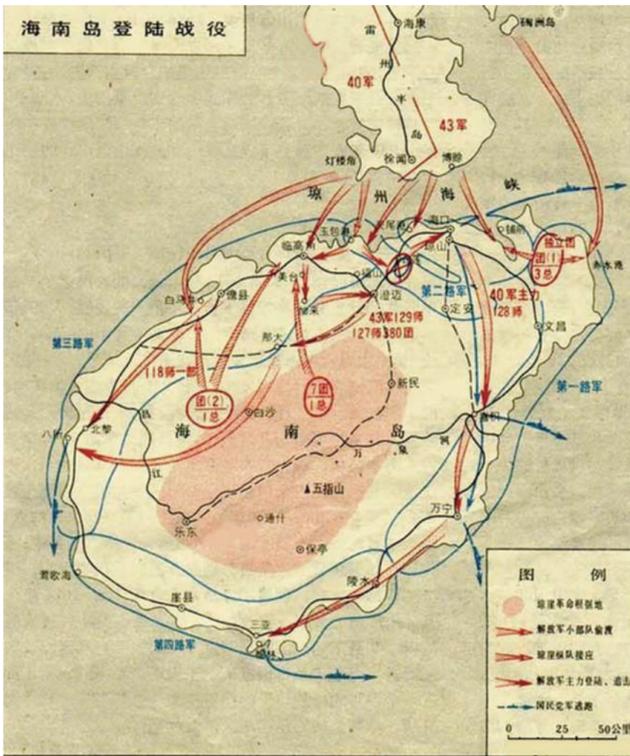
发扬军事民主,正确制定战役方针。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经过数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酝酿,不断修正完善而确定下来的。战前,毛主席根据登陆作战的特点规律,对如何确定这次战役方针问题,先后作出多次指示,并要求前线指挥员积极对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第15兵团和第40、第43军指挥员,在传达学习上级指示要求后,一方面多次召开作战会,认真讨论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积极领会理解上级意图;一方面坚持从战场实际出发,展开反复推演论证,梳理总结矛盾问题,并多次就渡海登岛作战的时间、方式、运载船只等重大问题,向军委和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建议。后经上下级反复磋商,对原定的作战方针作了修改和补充。一是将原定2月以前开始行动改为春夏两季内;二是兵力投送方式由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改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三是渡海工具由以改装机帆船为主改为利用东北风,以木帆船为主等。这一作战方针,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全体指挥员智慧基础上确立的,为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紧盯关键问题,周密组织战前准备。渡海登岛作战对我军来讲是一个全新课题,一方面要求战役指挥员必须慎重从事,认真吸取金门战役失利的教训,坚决贯彻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的原则,避免仓促促促造成过失;另一方面战局又要求我军必须尽快实施登陆,因为据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自2月起,已集中第62、第64军等部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向琼崖解放区发动进攻。这都导致了战役准备时间紧迫却又千头万绪、困难重重,既有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又有战术准备、技术准备等等。为此,参战部队自接受任务起,就一切从最困难处着眼,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统筹全局的同时,坚持突出重点,抓好最关键、最重要的准备工作,集中力量迅速完成部队思想教育、渡海船只征集、海上练兵、气象水文掌握、给养筹措、装备补充等多项关键性工作,从而实现以破解关键、补齐短板、带动和兼顾其他的方式,做好全面而充分的准备工作。此次作战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任务部队着力抓住了这些关键工作的关键,才有效解决了部队敢不敢战、能不能上得去、打不打得赢等问题。

把控作战规律,灵活实施作战指挥。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情况复杂多变,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实施精准指挥的难度极大。为此,第15兵团和第40、第43军指挥员对此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就敌情、我情和战场情况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调查研究,探寻渡海作战基本特点和规律,明确指挥关系、指挥方式和指挥权责等内容,制定了详尽的指挥方案,确保了整个作战过程中指挥不间断、部队不失控。同时,第15兵团还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和战役的发展情况,适时、果断、灵活地实施指挥。其中,第二批渡海的第40军118师加强团在起渡1小时后,海上风向忽然转为南风,

且大雾弥漫,使得灯光联络失效,编队队形产生混乱,前指当即命令各营以船为单位各自为战,只进不退,强行登陆。由于风向和水流的问题,结果登陆点偏东约27海里,且建制均被打乱,此时登陆部队按照预案快速收拢,建立指挥关系,完成新的部署,后经顽强作战,除少数船只失去联系外,大部与岛上部队胜利会师,到达琼西根据地。纵观整场战役,我军之所以能牢牢把控战场主动,避免被动,准确认识和掌握渡海作战的特点和规律,实施灵活指挥是关键。

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加强支前工作。海南岛战役自始至终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琼崖纵队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打的是一场渡海作战的人民战争。战前,叶剑英亲自主持召开全省支前工作会议,华南分局专门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从各方面给予渡海作战部队以全力支援。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海南区委和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一切服从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为指导,积极开展“一元钱,一斗米”支前活动,短短3个月不到,就动员募集了40万银元、250万公斤粮食、各型船只1000余只、船工1400多人。此外,还组建了6万



海南岛战役略图

余人的支前队伍,跟随部队开赴前线,采用肩挑、车拉、船运等方法,源源不断将各类物资送到一线。战役发起后,琼崖纵队一方面积极开展反击,牵制国民党军力量,策应渡海作战兵团实施登陆;一方面又及时组织部队开赴各个预设登陆场做好接应,有力保证了我大兵团登陆的成功。在展开追击作战阶段,海南岛各族人民在琼崖区委和琼崖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力支援配合登陆部队勇猛歼灭顽敌。民兵武装展开广泛的破袭战、伏击战,阻击逃军;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供应站、救护站、情报站,帮助部队行动,既保证了部队后勤供应,又给予指战员极大鼓舞。

海南岛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瓦解了薛岳自诩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也粉碎了国民党军固守南海诸岛的企图,为解放沿海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极大鼓舞了部队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对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广阔海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史说新语

海南岛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瓦解了薛岳自诩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也粉碎了国民党军固守南海诸岛的企图,为解放沿海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极大鼓舞了部队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对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广阔海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铁匠庄村民间画家王兰坡,曾师从齐白石,他的画落款常书“拜石馆王兰坡”。日军占领武强后,千方百计地想收买他。王兰坡严辞拒绝并以诗言志:“画高六尺价三千,可惜老夫不爱钱。粮米本是活人物,嗟来之食不可餐!”

革命战争时期的武强年画将严肃的革命主题与传统年画的娱乐性结合起来,把送祥纳福祈求平安的愿望与革命崇高理想相结合,创造性地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融为一体,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反映了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政治生活、大生产、学文化、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重大题材,不仅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促进作用,而且提升了武强年画的艺术效能。

20世纪80年代,武强年画博物馆以抗战时期的革命年画为主题进行专题陈列展出,武强年画博物馆被命名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国防教育基地,革命年画成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活教材。

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

从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诸多论兵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研究探讨“攻守之策”。在他看来,战争应尤其注意“攻守结合”和“攻守适宜”。传统的奇正之术,也被他继承并发扬光大。

攻守并重,恃险固守

在戚继光看来,所谓御戎之策都归结于攻与守:“惟守守二端。”如果发起进攻,就一定要做到战而胜之;如果决意防守,就一定要守得固若金汤。其实,就战法而言,无论如何千变万化,都会归结于一攻一守。也就是说,进攻与防守,始终是战争的基本形式。故此,《孙子兵法》等兵学经典,对攻守之道都有很多论述,经常将“攻”和“守”并列进行讨论,如:“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等。

考察戚继光的军事主张可以看出,他全面继承了孙子的上述观点。他认为,进攻和防守都可以夺取战争主动权。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指出:“兵法:‘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也就是说,攻和守无法截然分开,虽说是一对矛盾,但始终互相依存。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更强调的是攻守并重,明确反对“偏举”,并且呼吁加强防守战术的研究。

注重防守,这其实是针对当时明朝面临外寇大肆掠夺的现状而提出,非常具有针对性。戚继光非常清楚当时边防松弛的情况,他指出:

“当承平久,外寇以掠为务而弗力攻,故多讲战,腹里尤绝不言守,卒然有变,何以应之?”

当时,无论是北边的游牧民族,还是南边的倭寇,有不少袭击都是深入腹地,大肆掠夺一番便撤走。对于这种来去匆匆、飘忽不定的袭击,扎实的防守显得更为重要。如果疏于防范,未能做好防备,那就只能坐等敌寇前来侵犯。戚继光论“防守”,非常看重依靠山川之险和修筑炮台,认为“守险”和“恃险固守”,是“正全国之道”,既可以事半功倍地戍边御敌,也可以在防守中找到反攻机会,打击来犯之敌。

进攻:“大战之术”的核心

在反对“偏举”的戚继光看来,大概只有一种情况下,应该全力以赴地发起进攻,即发起“大战”时。戚继光认为,一旦发现有战机,就应迅速集中兵力,果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这便是他重视和反复强调的“大战之术”。

戚继光的“大战之术”,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明显更强调进攻。对此他在《练兵实纪》中有具体论述:

“大战之术,只是万人一心,数万人共为一死夫,务使胡虏大创。彼一败后,便有数十年安,十数年生养受用,日后我军士卒皆过太平日子。”

从中可见,戚继光所谓“大战之术”,其实是战略决战和战略进攻。也就是说,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发起大战决来重创对手,使得此后能长久获得安稳。在戚继光看来,通过适时组织发起这种“大战”,可以使得敌人“一战心寒胆裂”,收长久之功。

提出如此主张,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戚继光的作战对手,或是游弋海上的倭寇海盗,或是游牧草原的骑兵队伍,他们都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都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基本作战目标。一旦战争目的实现,就会迅速撤出战斗,消失在茫茫大海或无垠草原,踪迹难寻。与这样的对手作战,戚继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攻守战法

■熊剑平

光必须强调一击制敌。一旦发现作战时机,就一定不可错过。

奇正:攻守的力量分配

在战争之前,分别“奇正”,即确定用兵谋略和进攻方向,是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管子·幼官》中说“定依(正)奇胜”,意思是说在战前能正确确定奇正战法的就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至于“以奇用兵”,更是兵家圭臬,经许多战争实践的反复检验。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不仅主张‘以奇胜’,也借‘以奇用兵’发展了‘诡道’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战理论。”

戚继光对于奇正的论述,并未超出传统范畴。他在《止止堂集·策问》中指出:“用兵之法,不过众与寡。众寡之用,不过奇与正。众则正用,寡则奇用,固定法也。然成列而鼓,用正之经也,将废奇可欤?出其不意,用奇之权也,将废正可欤?”在戚继光看来,两军交战,就兵力运用而言,尤其是进攻的发起,都需注意众寡之用。而且,众寡和奇正相伴相生:“众则正,寡则奇。”不仅如此,运用奇正之术,一定不能拘泥,而应始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既需要使用正兵,也需要同时使用奇兵,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众寡和奇正探讨进攻的方法,是从《孙子兵法》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典重点讨论的内容,戚继光对此忠实继承,而且善于灵活运用。

战争年代的“革命年画”

■曹永雷 刘金英

在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武强年画博物馆,有着一批特殊的年画。它们大多创作于革命战争年代,其内容却与普通年画迥然不同,祈福迎祥的主题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的武强年画,将保家卫国、拥军爱民的情怀融入传统民间艺术,尤其是在延安“鲁艺”革命画家与武强年画艺术家的结合创新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风起云涌。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武强年画艺人以画笔、刻刀反映民情民意,创作出大批反帝反封建及民主革命内容的政治年画。

作为木版年画之乡,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城南关画业一条街,有字号可查的年画作坊有144家,周边68个村庄还有一千多个年画作坊。但是,自从1937年9月日军占领武强,画店作坊也遭受灭顶之灾。当时南关的“恒兴永”画店,业务十分红火。日军占领武强后,怀疑这家画店内藏着八路军,开枪打死了店主贾世权的姐姐,并用硫酸弹烧毁画店和画版。这只是日军残害武强年画的一个缩影。

“到敌人后方去。”1938年秋天,革命美术工作者阎素来武强学习民间艺术,他借用武强年画套印方法制作的《打日本打汉奸》抗战门画,颇得群众赞赏。这一时期,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家彦涵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深入冀中,采用武强年画木刻技法创作了《王三群

全家被害》等新版画,在抗战军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徐灵利用武强民间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雕刻了装饰性很强的《抗日光荣》《立功喜报》,轰动一时。他们在吸收借鉴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几经探索和研究,为配合军事胜利,创作了《木刻捷报》,由群众敲锣打鼓赠送给军烈属、功臣家属,使武强年画成为宣传抗日、鼓舞抗日的特殊武器。

随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奔赴冀中,与武强年画艺人一同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后来,冀南木刻团的画家也到冀中与其汇合,形成一支文化劲旅。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吴劳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学习武强民间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旧年画进行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造,并同武强的年画艺人郝云甫、陈文柱、张福旺、张万年、肖福荣等一起,创作出许多宣传、鼓动抗日的优秀作品。他们创作的《打日本救中国》《战斗英雄》《人民靠山》《欢迎新兵上前线》《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人民救星共产党》等一大批新年画,历经战争的考验,冲上了人民战争的前沿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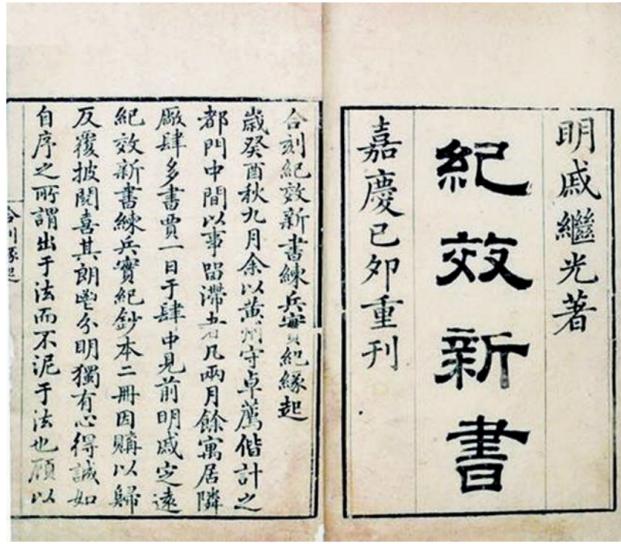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武强年画,在革命老区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的《保卫边区》年画,把武强年画中威风凛凛的“门神”换成了骑马挥舞大刀八路军勇士,成批刻印后张贴在敌占区家家



武强年画《打日本救中国》



武强年画《保卫边区》



《纪效新书》书影